

三、操纵国政的官僚

尽管经过战败但丝毫未触动官僚制度。在这样的官僚制度中一小撮官僚的经过曲伏又爬上来了，现在又通过在全国布置官僚机构，随心所欲地驾驭国政。

从一开始就有差别

迄今为止不断空洞化的国权的最高机关是国会和把国权私有化了的自民党、佐藤派以及与其相勾结的财界的实态都看到了。可是在国会、自民党、财界的背后，支持保守独裁的是一小撮官僚和官僚制度。因此，我们要追溯从官僚诞生到退职、“下凡”的时间来揭露统治日本的官僚机构的实况。

“在自由和权利中，是生而平等且平等生存。”（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

文章开始稍微扩大一些范围。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中，如众所周知是以自由的个人用契约关系结成的。现代以前的社会关系，都是生来有“身分”等级不变，来统治着个人的生活，身分制度有时会夺去人的生命。可是，现代是“从身分到契约的时代”。不管有多少资产的人，如不根据契约，要限制人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况且，人们生活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法国人权宣言的内容，在今天的时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少，是在西欧社会是以理所当然的可以接受的。

然而，这种宣言在我国官僚制度中，未必是适用的。“官员一开始就有身分的差别，一生围着这个转”——这样

的话依然通得过的。一旦，拿到了官僚制度的“超特急”快车票，中途下了车另作别论，无论为何要被尽快送到较远的地方（很高的地位），持普通车票的人，不管怎样努力想乘“新干线”列车是不可能的。不！那只是身分上的差别，在这样的官僚制度中的机构差别，尤其是我国官僚制度的癌症！是产生各种“黑雾”的元凶。因此，要把这种实际情况通过事实加以说明。

东京大学是高级官僚的预备学校吗？

人事院每年夏天都要实施以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为对象的高级公务员考试。这种考试是可将来成为高级官僚的人最初必须通过的“最后”难关。同样是这样吧！例如一九六九年度，高级职员（甲）中，虽然有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三人的接受考试者，最终合格者只有一千三百零六人，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七。高级公务员考试是一大难关是不容否定的。

可是，关于这种公务员考试颇有趣闻。操纵现在的官僚制度的不用说谁都知道是“东京大学出身者”，东大出身等于官僚，获得东大出身的官僚后继者成为眼红的事情。由于东大纷争，虽有自民党的极端议员提出了废除东大的口号，舆论虽有东大学生质量低劣的说法，但各省厅追求东大毕业生的热潮依然不是冷却。

首先，人事院的当事人在每年五、六月，以东大的法律系、经济系在籍者为对象建议东大当局召开就职说明会，在说明会上，人事院说：“高级公务员考试合格者是要乘超特急快车的人，接受这项考试，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近来因为东大法律系、经济系在籍者逐渐多进入就职工薪较多的民间大企业，除此而外是无法制止东大学生进入官界吧！尽

管如此，人事院的当事人，把与此相同的说明放在其他大学校来稿的这种事实至今还没有听说过。

这种公务员的考试一开始，正像予料那样很多学生都蜂拥而至。

东大纠纷达到最高潮的一九六九年度也是这样的结局，从东大来的很多学生应试。其中法律、文学、经济方面合格者（甲）三百九十四人中，从出身的大学来看，东大者近半数一百九十四人。其他旧帝国大学合格者加起来只有八十六人。以下除旧帝大以外的其他国立大学五十二人，公立大学九人，私立大学五十二人，其他方面一人。一九六八年的法律、文学、经济合格者四百零一人中有稍稍超过半数的二百零四人是东大学生，一九六九年同一九六八年比较得到完全同样的结果。

东大毕业生合格率高的原因是：①、能力优秀者有“实力”；②、应试者人数多——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有人指出：“考试出题的倾向多据东大日常教学内容”。

在一九六八年东大入学考试中，超越日比谷高中，居全国首位的是兵库县的私立滩高，对此有人说：“那不是高校而是东大予备学校”。因为该校教学内容同普通高中不一样，是按东大的考试出题内容来决定教学内容。如按这种逻辑来谈即“东大不是普通大学，而是高级官僚予备学校”。不过，仅就公务员考试却是，把东大的教学内容拿来作参考拟定公务员考试试题，有这种相反的关系。

这样，在公务员考试中合格的人到自己志愿的官厅接受面试，除了特别重视考试成绩的大藏省等之外，如果是东大毕业生大体上都能按自己志愿被官厅采用。厚生省有个干部至今还自夸的说：“我当人事科长的时候，非东大毕业生不

用”。这样一小部分高级公务员考试合格者（过去的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在录用的同时，站在庞大的官员集团之上作为优秀分子受到优待。

二十多岁就任科长职务

一本叫“名簿”的小册子出自于自治省的总务科被分送到与旧内务省有关的省厅。这个名簿把高等文官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合格的与旧内务省有关省厅（自治、警察、建设、厚生、劳动）的超特急一类的人物列成表格，刊载了直到一九六九年被录用的人。

看到这个表格令人吃惊的是，一九六三年被自治省录用的人（十九人）多数已经转至县的科长。如以大学毕业之年为二十二岁，他们还只有二十八、九岁，他们“出世”之早在民间企业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想像的。那么一九六三年被录用的人物就是那么优秀吗？

转入A县当了科长的B氏是一九六三年毕业生中的一个人，B氏说：“明白地说，这个县的中小企业的事情我很不清楚。事实上是听凭于老练的科长辅佐。我们不是为了来工作，而是到这个县来‘进修’的”。

另一方面，在接受超特急一些人的县也不对这些年青科长寄予多大的期望。那么目的是什么呢？是中央对地方支出的补助金是最大目的。C县的总务部长泄露天机的说：“自治省的青年科长们怎么都好呢？只是，不提供中央要求的职务担心补助金出现差别。”不过，虽说补助金也不光全是自治省拿出的地方交付税。建设、农林、厚生、运输、通产等各省各自出了一些线。这样，中央的省厅根据“出资金”的种类和金额，向地方提出部、科长职务的要求。

例如北九州市，于一九六七年三月革新市长吉田法晴下

1963年自治省录用者的职务

工 作 岗 位	姓 名
鸟取县总务部地方科长	秋本敏文
自治省行政局选举部管理科	居福光臣
佐贺县企划室次长	池上 徹
自治省行政局行政课	池内祐司
香川县企划部效率考査班主任	石 田 淳
秋田北税务署长	远藤安彦
株式会社精机工业所代表董事总务部长	龟山清(旧姓神山)
群馬县卫生民生部医务科长	小寺弘之
中部圏开发整備本部	佐藤一雄
长崎县商工部中小企业课长	志村哲也
福岛县厚生部妇人儿童科长	鹤冈启一
奈良县水道局经理科长	富永荣一
外务省大臣官邸領事移位部移位科	永田尚久
消防厅预防科	西泽辰夫
自治省财政局指导科	久间健二
岛根县水产商工部劳动训练科长	古厩博治
自治省行政局公务员部公务员第一科	古内明郎
自治省财政局地方債科	山崎安一郎
长野县总务部人事科电子计算机室主任	渡 边 明

台，保守市长谷伍平上台，从中央“下凡”的青年官僚连续不断，近二年半的期间里副市长、局长级六人，部长、科长级各三人，股长级一人是中央出身的官员。对此市议会虽批评说：“以前从中央‘下凡’的只有一个人，而谷市政竟然追随中央”，谷氏却满不在乎的说：“因为本地没有有能力的人，只好从中央邀请”。

一九六七年六月，福冈县也从革新县政变成保守县政，副知事有两人，百分之四十的部、科长职位被中央来的人占据。自治劳(总评系，以自治体劳动者组成的工会八十三万人，委员长栗山益夫)在一九六九年的中期调查中提到：以

“超特急集团”“下凡”到地方的人数中，建设省有二百五十人，自治省有一百七十人，农林省有一百一十人，厚生省有一百人，劳动省五十人。即平均一县有十几个人的干部职位被中央下来的超特级集团所占据。

所以这种以中央的补助金为背景，向地方派遣青年科长同地方提拔起来的官员集团之间的关系是不融洽的。地方官员集团反抗激烈的时候，就要求排斥中央官僚的“下凡”，脑中有这种意识存在，就会对中央官僚出现直接间接妨碍业务和贪污。

第一任务是扩张势力范围

在地方，无大错过的当过科长职务的青年超特急官员们，作为中央省厅的科长助手又回来了。而他们的工作就是扩张所属省厅的权限——一切与此有关连。

第一是法律案的起草。所属省厅所管的法律越多，那是表明该官厅的事务复杂权限也很大。因此各省厅对法律案的制定工作倾注最大的力量，从事法律案的起草工作都是年轻的超特急官员们。有时光是他们同内阁法制局、自民党政调会交涉。

像这样他们制成的法案成立如否，对他们自身将来的出头也有微妙的影响，有时也同其他省进行激烈交锋。

建设省在一九六六年的国会上提出了“流通中心法案”。该法案在大都市郊外设立一大汽车终点服务设施，在使农村和大都市物资运输流畅的同时，也要使都市交通理想化。这个法案虽是建设省都市局都市计划科的青年科长助手们起草的，该法案的内容正因为以开拓新的领域为目标，各省厅提议进行法案共同管理。无法制止建设省的势力扩张，对此，建设省的助手们借助于同省干部之手虽然进行了防卫战，对其

他省的强行共管要求也不得不让步了。“失败”了的建设省科长助手们遗憾的说：“像这样进入各省厅的流通中心无论如何是不能搞的”。这样以来，流通中心从一九七〇年虽然正式开始工作，但如所想像，遇到各省厅的干涉，未能发挥其本来的有效机能。尽管他们是国民公仆的国家公务员，因为他们要自己出人头地和所属官厅扩张势力范围，要制作规定国民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实在是困难的事情。

第二是同有关系行业者的交涉。建设省当然同建设业者，而运输省同运输业者各自有较深的关系这是自不待言的。例如，一看一九五一年制定的道路运输法，从事业许可开始到营业的废止，实际上有三十五个项目，必须得到运输大臣、陆运局长、知事等的批准、许可。

可是，同这样的行业者开展广阔的窗口事务的中心是这些青年科长的助手们，因为他们同行业者之间的结合也是不可避免的。“通产省某局的助手们聚会费是某某汽车公司出的”“据说厚生省某局辅佐把高尔夫球的帐单转给了某某制药公司”——这样的传说充满了霞关周围。

同这种行业者结合得越深，终究会发展成为贪污的根源。围绕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一九六七年度到一九七一年度），防卫厅官员们同商业公司之间的“黑雾”即其典型例子。就像最近的武器那样应用了电子工学的部门的机密，称为防卫厅的局长，幕僚长等最高干部都不很理解。

因此，以推销防卫厅的武器为目标的制造厂和商店，接近在现场承担指挥的校级军官，探查将来防卫的秘密计划和投标价格等。

而且防卫厅原来的军官“下凡”到商社向在防卫厅的陆海军同期及后辈要求泄露机密，要求提供防卫计划情报，因

此，不能不泄露机密情报的。

围绕向国税厅、道路公团等导入电子计算机的贪污事件也发生了。现在各省厅正在使用的电算机约有三百五十套，围绕这些电算机购入，国内有六家公司，国外系公司代理店有五家出租竞争极为激烈。而且，电算机的购入计划的立案、操作等技术方面很多问题，同行业人员的交涉均由助手们来完成。国税厅的科长、助手道路公团的总务部事务合理化推进室代理室长一级的人成为贪污事件的主角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疲惫不堪的太阳旗官僚

那么纠正站在官僚行政事务第一线的科长助手们所造成的弊病怎么办好呢？

第一必要的是让这些中坚干部乃至干部预备生在各省之间进行交流。现在的超特急官员集团一旦被某省厅雇佣了，就以此为根据地，特别是退职“下凡”以前可以得到出路的关照。因此，比作为国民公仆的思想，更应首先忠诚于所属官厅，就像民间企业工作者那样热心于“企业思想”。建设省的人要有为“太阳旗土建公司”服务的热情，运输省的人要有为“太阳旗运输公司”服务的热情，而通产省的干部恰好应有为“太阳旗重工公司”服务的热情。

特别是最近常听到这样说法：“外务官僚视野狭窄，不懂一般行政事务常识”。

“除了赤道非洲原始人和西南亚的霍屯督族，日本人是世界上所有人种中最缺乏肉体魅力的人种”。因为著作这样轻视日本人的书，驻阿根廷大使河崎被撤职。我们想“这样无知的大使怎么能成为外交官呢？”可是据说河崎氏却是外务省内全面通晓语言和社交的“多面外交官”。在一般社会

中被看做不懂常识的人而在外务省却被看做是通晓常识的人。恰好像在第六十一届国会上，自民党连续采用非常手段强行表决而对此并不感到异常极为相似。虽然如此，而把这个河崎大使聘为三菱重工的顾问就更加不可理解了。

外务官僚缺乏常识是他们起初就同一般的国家公务员有区别，同受接外务公务员高级考试不是没有关系的。外务官僚首先强调“与一般公务员不同的”妙处在于推选贤良优先思想，自己没有发觉本身的“无知”。因此，外务省官僚如能派往建设省，或者，厚生省的官员如能转成外务省的职员，不能给日本的行政增加一点活力吗？

一九六四年以前，存在所谓高级警察官考试，虽然警察官的超特急官员集团由于考试被录用，而废止了高级警察官考试后，一般职员因为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合格者可以像超特急官员集团一样被录用。其结果（警察厅干部）据说：“性格和思想方面有比较平衡感觉的干部候选人增加了。”如果废除外务公务员考试，就会抹掉外务官僚独特的“宫中侍女”的感觉，在公务员身上必须有公仆思想，严禁“企业思想”。

第二是录用有出息被疏远的中级官吏。在现在制度下，中下级官吏被糟蹋，稍微一马虎就得为利权奔波，把中下级官吏放在流动部门虽然不能立即提拔，至少，因做干部的工作，应确保其特别地位。国铁为了确保铁道管理局长的职位，一定用非知识人士（所谓超特急集团以外的人），这些都是好的惯例。假如开辟了这种录用非知识界人士的道路，超特急集团也会闲置起来的。

第三是设立强有力的监视公务员工作的第三机关。现在公务员的采用、薪金、派遣审查由人事院、劳务由总理府人

事局、行政管理和监察由行政管理厅分别负责管理，在这里人事院的权限不足（特别是关于向外派遣的规则）和行政管理厅不周密的行政是很明显的。行政管理厅不周密的行政是由于该厅老年化和二流官僚（成绩和效率都低劣）的原故。改革行政首先必须从总管的行政管理厅的人事修正开始。尤其是设置对防卫、电算机、科技部门等专门的领域监督的机关是很必要的。由一介行政官来管理和监督这些专门领域的行政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必须借助于掌握特殊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外省厅人员。

还有关于防卫在国会内设置了特别的常任委员会、国会议员应该经常涉及其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由文官控制军队的效能。

推动政治家的官僚

担当了中央官厅的科长助手而晋升的超特急官员集团，转入地方的支部分局或都道府县的部长，经过二年到五年，将来又回到中央官厅的部里成为科长乃至局长。这样，在局长之中如被选中一个人作为次官一级的官僚好不容易达到最高的位置，在中央官厅成为次官、局长就有了议员以上的“权力”。

一九五四年鸠山内阁当时，甚至有“太上皇”别名掌握巨大权力的日银总裁一万田就任藏相，把离次官较近的石田官房长突然“降职”为汇兑局长。可是，对这件事次官以下的大藏官僚一再反对，终于遭到连大臣秘书官也选不出来的抵抗。因此，“一万田股票”暴落，其后连自己的选举只能勉强以最下位当选，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后来成为通产次官的佐桥滋氏（后来是佐桥经济研究所所长）也被称为“通产天皇”，每次内阁改造上来的官僚，

也都根据自己的意向进行人事变动。

然而，一九六三年当了通产相的福田一氏，把被看成是次官合适候选人的佐桥企业局长(当时)委任为特许厅长官，要把今井特许厅长官任命为次官。因此，福田在省内极可得心应手，福田氏留任，今井氏仍任次官，福田氏一去职，立即实现了佐桥次官。

一九六七年流传为话题的是下田外务次官(后驻美大使)。当时下田次官关于当前是重要问题的“核处理”，接连不断的发表“下田设想”使自民党的实力者、三木外相大为惊慌。然而，下田次官在重要发言之前必定要求佐藤首相允许。因为三木外相，从佐藤——下田线上疏远，造成具有讽刺意味的下田外相和三木次官的说法也不是没有缘故的。

舞弄权力的背景

那么，他们这些高级官僚舞弄权力的背景是什么呢？

第一、虽有第二次大战的失败，但官僚制度几乎没有受“伤”。在战前抖擞威风的内务省诚然解体了，但其“精神”和“人材”仍然被建设，自治、厚生、劳动、警察等各省厅接收了。因此，旧内务省被解体，作为全体来看，反而比旧内务省更具有执行予算能力的“势力范围”。

第二、政治家的天资问题。战前的政治家，姑且不论其方向如何，具有作为政治家的见识和治国安邦的“气概”，而战后的政治家，特别是保守政治家的矮小化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其主要原因是选举方面的困难。战前的政党政治即为保守党政治，日常的政治活动和选举运动等，保守政党能够随心所欲。然而，战后，迎来了大众民主主义时代，对政治较疏远的劳动群众、中小企业者、主妇等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革新政党对保守党的压力，保守政党内部乱立候选人也。

是极为明显的，即便是“大政治家”对于选举也不得不给以最大的关心。因此，政治家为了把布满自己选区的官僚机构用于自身的选举，而迎合了官僚。还不仅如此，战后的保守党由于被整肃等原因而形成人材不足之际，而使积极的官僚“转向”为政治家，甚至把权力中心的职务也交给这些官僚。运输官僚的佐藤首相，大藏官僚的池田首相，通产官僚的岸首相，更有以官僚为核心打下战后保守政治的基础的吉田茂本身也是外务官僚出身的。

官僚得势的理由此外尚有：①官僚能够保持“具体的”控制现代复杂的政治机构的制度，②日本的官僚的天资与民间出身的政治家比较有优秀的一面。

“下凡”官员也跋扈

可是，舆论对这些高级官僚的批判也逐渐强烈起来了。庶民的朴素的批判主要是面对官僚的公私不分。建设官僚利用官僚机构大肆违反选举（一九六六年），同样因违反选举而接受停止公民权的厚生官僚的复职（一九六六年），滥用了日本航空、全日空的免费乘机券的邮政省干部（一九六七年），利用官僚的地位随便进入了高尔夫球场的防卫厅干部（一九六八年）围绕八幡、富士两制铁公司的合并问题向公正贸易委员会施加压力的通产省官僚（一九六九年）等，这些都受到严厉批判是众所周知的。

可是，尤其必须严厉弹劾的是高级官僚的“下凡”吧。

人事院于每年二月发表反映前一年从中央官厅“下凡”到民间企业再就职人员实际情况的《“下凡”官员白书》，一九六八年也达到一百三十六人（一百三十七件）的高级官僚下凡了。一看这个《白书》的各官厅，居首位的是大藏省的三十四件，其次是通产省十九件，建设、农林省各十七件，

运输省十三件，有许可权、财政运用权的经济官僚，即所谓“利权官厅”占压倒的多数。像这样的“下凡”干部在一九六九年也大模大样地搞了。由于这种情况，在那种“下凡”场所提出一些疑问的官僚也不只是一、两个人。特别是从大藏省的地方财务局长就任信用金库常务的人，从大藏省的税关的监查部长就任税关货物处理公司的顾问等，在退職前的官厅职务种类同“下凡”公司的职务种类有着十二分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一九六五年六月退職的佐方邮政次官，成了为邮政省制造轻便机器脚踏车的富士重工的嘱托，今天又“荣转”为常务，富士重工的轻便机器脚踏车订货合同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

“下凡”到伊藤忠商事公司的原防卫厅的军官集团的官员数人，同现役的防卫厅军官集团官员勾结起来泄露了有关三次防的机密，“发生了问题”。

此外防卫厅的军官集团（一九六七年一月到现在，一等校官以上）向三菱重工业“下凡”十三人，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八人，川崎飞机制造（现在的川崎重工业）十人，日本电气十二人等，向承担每年五亿日元以上的装备品的四十四家公司下凡九十六人，这些“下凡”的官员在“下凡”的公司与防卫厅军官集团之间经常搞见不得人的活动。

防卫厅现在讨厌对军官集团“下凡”批判，虽然不公布其实际情况，但根据一九六七年当时相当多的军官集团“下凡”的官员可是确实的。

高级官僚还有一个“下凡”渠道，就是到公社、公团等特殊法人那里去。

一九六九年根据总理府调查，在特殊法人的七百二十一名干部职务（限于总裁、副总裁、理事长、理事、监事、总

下凡・高級官僚（1969年、毎日新聞調査）

姓名	原来职务	下凡单位	下凡日期	退职金	退职时给薪金	下凡单位给薪金
山本正淑	厚生省事务次官	医疗金融公社总裁	8月26日	12455100日元	261400日元	410000日元
原山亮三	运输省汽车局长	首都高速道路公团理事	8月18日	7698600	182000	X
山下武	建设省都市局参事官	日本住宅公团理事	8月25日	358800 (中途转职)	185000	X
冲达男	建设省建设大学校长	住宅金融公社理事	8月26日	2592510日元	139000	265000日元
今竹又一	关东警区警察局长	清酒制造业退职金 共济组合理事	7月初	未支給	206400	230000
铃木光一	警察厅交通局长	京三邮作所董事	6月27日	约900万日元	206400	X
田付景一	驻意大利大使	海外技术协力事业 团理事	7月15日	17108400日元	282000	X
实本博次	厚生省援护局长	年金福利事业团	半年前	8730720日元	195232日元	
高柳光夫	国税庁次官	証券团体（未设立）	半年前	X	X	
武藤谦二郎	大藏省关税局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	11月	X	X	

（注、有X者为拒绝回答）

经理、董事)中，被原来是高级官僚所占据的有三百六十三人(百分之五十点三)之多。一看这些人的出身类别，居首位的大藏省占五十九人，农林省五十人，通产省四十二人，运输省二十八人，文部省二十七人，建设省、警察厅各十七人，经济企划厅十六人。特别是资本的大部分依赖政府出资的公团(十三个)、事业团(二十一个)中“下凡”的官僚更多，二百六十九个干部职位中有一百七十七人(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八)是官僚出身者。这也是大藏省居首位，其后是农林、通产、运输、建设、经企等经济官厅，与权利相连的官厅并列在一起。

支給的薪金就更多了。据总理府调查中，有二十五个人总裁中，有八个人每月给薪金四十七万日元，十六个人月给四十一万日元，一个人每月给三十七万日元。此外，副总裁、理事长，总经理一级的每月给四十万到三十二万日元之间。顺便说一下，处于监督这种特殊法人地位的大臣每月月薪大约四十万日元。不管怎么说，住宅公团总裁由防卫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担任，住宅公团副总裁由国税厅长官担任、住宅公团监事由邮政省出身的人担任等，怎么看这都是“不适合的人材不适合的场所”。

况且，他们都是过了多少个公社、公团。例如石坂弘由农林省总务局长到肥料分配公团副总裁，再到中央竞马会理事，又到森林开发公团理事长等，河野通一由大藏省理财局长，经过开发银行理事、商工中央金库副理事长到国民金融公库总裁等。这样，他们每当职务变化时都领取几百万、几千万日元的退職金，由于这样到处奔走谋生而受到批判，被称之为“公团候鸟”。

保障高级官僚的身分

主要的“横岛”高级职员及其退職金

姓名	年龄	职务经历	期间	退職金(日元)
舟山正吉	64	大藏省事务次官	53年退官	2,001,200
		日本银行理事	53.9.—56.7.	3,234,000
		卖公社副总裁	56.7.—58.2.	1,960,000
		日本输出入银行副总裁	58.2.—62.12.	10,335,325
		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总裁	62.12—65.12	9,984,000
		国铁非常勤理事	66.12.—现在	
河野通一	60	大藏省理财局长	57年退官	1,990,000
		日本开发银行理事	57.6.—61.4.	5,920,000
		商工中金副理事长	61.4.—67.4.	18,100,000
		国民金融公库总裁	67.4.—69.11.	
		日本银行副总裁	69.11.—现在	
森永贞一郎	58	大藏省事务次官	59年退官	2,400,000
		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总裁	60.6.—62.12.	5,339,570
		日本输出入银行总裁	62.12—67.4	14,872,000
		东京证券贸易所理事长	67.4.—现在	
酒井俊彦	59	大藏省汇总局	60年退職	2,700,000
		日本输出入银行理事	60.4.—61.6.	1,638,000
		国民金融公库副总裁	61.6.—65.9.	8,619,000
		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总裁	65.9.—现在	
石田正	57	大藏省事务次官	61年退職	4,557,800
		国民金融公库总裁	61.6.—67.4.	16,152,500
		日本输出入银行总裁	67.4.—现在	

为了创造这样“美味”的某特殊法人，高级官僚直至政治家都动员起来了。编制一九六七年予算的时候，厚生官僚以迫在眉睫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为诱饵，推动与自民党有关人员，强制创造了环境卫生金融公库。“下凡”官员团体的少数厚生官僚，为自己退職后的下凡先作好安排，丝毫不考虑对于设置金融公库的不合理性和强行设置工作的舆论批判等。

那么要抑制这样的“下凡”官僚怎么办好呢？第一是保障公务员的身分和改善待遇。现在的高级官僚入省以来直到次

官之前都是以较低的工薪待遇，甚至不到五十岁，就必须“为晚辈让路”。成为防卫厅军官集团，将官级五十八岁，准将官级五十五岁一级校官五十三岁，二级校官五十岁必须“退休退职”，因为这同一般公务员给较高的退职金的奖励退职不同，强制退职退职金也只给一点点。从当权有势任职时起就为“下凡”到公司第二次找工作而奔走。在公务员中在给更高工资的同时，退职年限也应延长。

第二严密监视“下凡”。从保证公务员的身分开始，高级公务员的“下凡”也必须进行严格控制，现在的“下凡”是官僚个人及官厅同“下凡”的企业、公团之间的“自家交易”，这中间应有第三机关介入，对“下凡”进行合理的审查是必要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特殊法人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工会（委员长河西明氏，三百四十人）反对高级职员“下凡”，毅然进行了全面无期限的罢工。该工会的主张是：①七个高级职员全是官僚出身，特别是部长、科长等管理职员四十人中半数都是原官僚。②原官僚都是临时打算因此毫无干劲。③“下凡”人员薪金上涨的幅度，比一般工会会员高二到六倍，这是极不合理的。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工会的斗争，指明了一般“下凡”官僚存在的问题，博得了舆论的同情。自治工会也以反对中央的“下凡”而积极活动，反对“下凡”的情绪不断高涨。

不过，要想根除“下凡”的根本弊害，佐藤首相对于行政改革不感兴趣是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统治地方的中央官僚

可是，能够随心所欲的支配中央政治权力的中央官僚，现在渗入到地方自治体内部，其实际情况以前面的北九州市、福冈县等为例便一目了然。

那么，造成这种中央统治地方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

财政问题。例如，一九六九年度的地方税收予计以二万七千九百九十八亿日元，这是不能维持六万六千三百九十七亿日元的支出。因此，为了维持地方大幅度的支出，必须把国家所得、法人、酒的国税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作为地方交付税接受过来（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亿日元），依赖各种国库支出金（一兆七千四百五十九亿日元）。特别是对各省附带有强有力条件的国库支出金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县政的财政、人事方面由中央加以掌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此，例如：道路、财源移交地方管理，强化地方的自主财源是先决条件。

第二是地方公务员的素质问题。现在的地方公务员作为全体来说比中央官厅低劣也是事实。可是，地方公务员中有一部分是极为优秀的也是事实。尽管是这样，地方团体若不培养这一部分优秀的公务员，在人事方面永远也不能从中央独立出来。在让优秀人材到中央“留学”的同时，其晋升至少是必须同中央向地方“下凡”的官僚等量齐观。

第三是地方公共团体要有保卫地方自治的“气概”。地方居民展开活跃地保卫地方自治的居民运动，以地方自治体的“独立”为后盾也是有效果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地方自治法同日本国宪法同时实施，宪法由于中央的保守政党，地方自治法由于中央的官僚不断地釜底抽薪而使其空洞化，像这样的政治反动化无论如何也应该防范啊！

自己掐脖子的地方自治体

造成地方自治法空洞化的最大原因是，应该明白主要是地方团体本身。“下凡”为长崎县的一个科长是自治省的超特急官员说：“地方团体对中央的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怎么也不能令人理解。在现在的地方自治法下面，地方团体如果说不接

收中央的干部，补助金方面与其他县有差别是没有道理的。中央若有差别那就更成大问题了。”的确是这样。

在东京的千代田区平河町，有称为都道府县会馆的建筑物，地方团体在这里设置“前进基地”向中央进行陈情活动。例如埼玉县在东京的事务所有十名职员，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为确保知事每周进京一次使用，另外一个房间不用说是职员的办公室。这些职员每天围绕着原籍出身的议员、自治省转，为了使用东京的事务所每年的费用需要六百三十八万日元（不包括职员的工薪）。

既使从地理上考虑，对于埼玉县来说东京事务所有没有必要实在是个疑问。地方财政困难的时候，首长、议员同国
务相并列的提高工资（以大阪市长为例），不懂常识莫过于此。这里的地方自治体像要自己掐自己的脖子。削减这样徒劳的费用，应转用到与居民利益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福利、环境卫生等设施的整备方面来。

培育有根基的民主主义

第四是地方团体应该专心从事推进地方行政工作。这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实际当中却不是这么搞的。兵库县调查了从县里得到财政、人事及其他物资援助的外围团体的实际情况，至少有一百七十六个团体之多，这其中有七十五个团体一年间有十九亿日元（总额）由县予算支出的。在这里尽管是有县里的事情要办的，但是，为县职员退職后的糊口问题，也要使这些外围团体独立存在。

看看关东各县的实际情况，外围团体变成了“地方高级官僚”“下凡”的场所。前东京都副知事御子柴担任了首都高速道路公团副理事长、前东京都总务局长坂田担任了首都高速道路公团理事、前埼玉县农林部长伊藤担任了县农业机械化

全国都道府县的东京事务所

地区别	设立时间(年)	设立时人数	现在人数	地区别	设立时间(年)	设立时人数	现在人数
北海道	1944	10	90	滋贺	1949	3	11
青森	1947	10	34	京都	1947	5	8
岩手	1951	5	31	大阪	1953	10	25
宫城	1948	4	21	兵库	1950	5	13
秋田	1946	3	20	奈良	1949	9	13
山形	1948	3	20	和歌山	1948	1	15
福岛	1952	8	30	鸟取	1947	2	12
茨城	1948	8	8	岛根	1948	4	26
枋木	1960	6	10	冈山	1943	3	23
群马	1948	2	7	广岛	1948	5	20
埼玉	1952	8	10	香川	1952	6	16
千叶	1960	5	7	爱媛	1952	5	13
神奈川	1960	6	9	高知	1947	2	30
新潟	1947	6	17	福岡	1951	7	21
富山	1952	3	13	佐贺	1950	3	10
石川	1953	6	11	长崎	1951	6	16
福井	1948	10	13	熊本	1948	3	22
山梨	1949	6	21	大分	1938	2	25
长野	1948	8	36	官崎	1951	7	19
岐阜	1951	5	20	鹿儿岛	1947	1	19
静冈	1951	5	11	山口	1948	15	19
爱知	1953	6	15	德岛	1947	4	12
三重	1954	4	8				

公社理事长、前千叶县安房支厅长铃木担任了京叶管线公司常务等。

而且，仅是地方自治体的特别职干部、议员、委员等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八年的十年间，因受贿、强占等问题被逮捕的就有一千多人。因此，“保卫地方自治体的气概”遭到怀疑也是没有办法的。

中央官僚的专横和地方自治的衰落急转直下。地方自治的衰落一方面是地方自治体本身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人和物的压力是其主要原因。那么中央官僚依据什么来保证这种力量呢？一方面是官僚本身的行政手腕，另一方面不用说是依靠维持了战后二十年政权的保守政党。保守党同官僚之间在法案的成立、选举、特权等方面，在人和物两方面都胶着到难以分离的程度，如果说是机构的结合，说不定更恰当些。

因此，保卫宪法和地方自治的斗争，必须从拆散这种机构的结合开始。在中央广泛地集结力量壮大革新阵营，以此来动摇保守阵营的基础，在地方展开强有力的自治体运动——此二者相互结合起来握成一个拳头推进运动的前进是最重要的。这个运动成功与否，对每个市民都需要有保卫生活，保卫民主主义和宪法的意识和行动力量，这是自不待言的。